

南華日報社叢書之四

續和戰問題之討論

南華日報評論集第二輯

香港南華日報社出版

舊



目錄

- (一) 答 問……………佩 弦
- (二) 答問的幾點解釋……………佩 弦
- (三) 和議與統一……………流 沙
- (四) 國民黨切勿自暴自棄……………流 沙
- (五) 評五中全會宣言……………流 沙
- (六) 和議的時機與和議的運用……………流 沙
- (七) 結束中日戰爭與常識……………沈 觀
- (八) 和議的可能性……………君 泰
- (九) 一個總檢討……………流 沙
- (十) 動搖之害……………豪



『抗日就是一切』，那麼，抗日是目的了，然則爲什麼抗日呢？是爲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可見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是目的，抗日不過是手段。前年七月爲什麼主張抗戰呢？爲的是不如此不能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如今爲什麼主張議和呢？爲的是如此才可以保衛國家之生存獨立。目的闡明之後，抗戰固有其理想而忠勇奮發，議和亦有其標準而審慎沈著。何至搖惑人心撓動軍心？反之，說『抗日就是一切』，纔真是搖惑與撓動。因爲如此說法，會使人不知道抗日之目的是什麼。於是有人說『抗日爲的是統一』，所以要剷除異己的力量。又有人說，『抗日爲的是國共合作』，所以要肅清反共的派別。試問這種黨派紛爭的言行，是不是搖惑與撓動？

問 難道如豔電所說，無損於國家之生存獨立麼？

答 我認爲無損。

問 須知豔電所說，範圍廣漠。

答 豔電所說，只是原則。根據原則，進行談判，方纔能得到具體條件，不致廣漠。

問 共產黨人爲什麼反對呢？

答 共產黨人所以反對，第一因爲中日戰事一日不息，蘇聯一日安枕無憂。爲的使蘇聯安枕無憂，應該使中日戰事一直的打下去。第二因爲戰事延長，中國民愈窮，財愈盡，共產黨人愈有所憑藉。

問 其他人的反對呢？

答

據我看來，其中有一理由，就是不相信日本。他們以爲日本除了滅亡中國沒有第二條路，所以我們除了抗戰沒有第二條路。他們有了這樣的肯定，所以聽見議和，以爲危險。究竟日本是否除了滅亡中國沒有第二條路呢？這不只要看日本，並要看我們自己。一年零七個月的抗戰，我們自己已證明了中國不是可以滅亡。然而這還不夠，我們還要指示出來日本除了滅亡中國，還有第二條路，並且必須走這第二條路。這第二條路是什麼？是中日合作。所謂中日合作，即以善隣防共經濟合作爲基礎，彼此互相尊重，各自瞭解其所需要，而又互相瞭解其所需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以謀互助。如能如此，則歷年以來之仇恨，始可掃除，而現在之懷疑亦可冰釋。

。這不但與東亞之和平有關，而且與世界之和平亦有關。這第二條路是中日雙方所應共同致力的。日本如果不選擇這第二條路，日本必陷於絕大的困難。中國如果不選擇這第二條路，中國將無以保其生存獨立而進為現代的國家。

(見二十八年一月卅日南華日報)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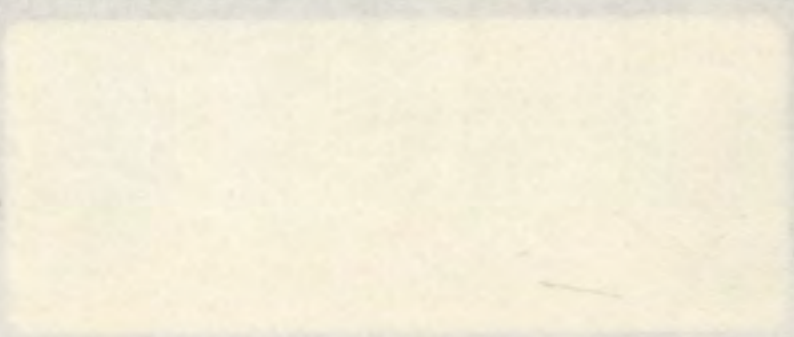


001687416



中國圖書館學會

第一屆年會



「答問」的幾點解釋

佩 弦

昨日本報發表的「答問」雖不就是汪先生的意思，也很接近汪先生的意思，因為這幾條答問是某先生最近與汪先生討論時局問題以後寫出來的。其中有幾點應該略加引伸，現在分條說明於下：

一，和議的主體，最近幾天有些言論機關，根據謠言而發為評論，或說汪吳對抗，或說汪吳合作。這些根據謠言的評論，足以淆亂我們正確的主張，及社會對於我們的認識。我可以十二萬分肯定的說，汪先生以及我們的主張，是戰由國民政府領導來戰，和也由國民政府領導來和。不得已而戰，是爲了中國的民族國家。不能戰而和，也是爲了中國的民族國家。要保持中國民族國家的生存獨立，必由三民主義的國民政府領導內政與外交。凡是受外力指揮與挾持的政權，都不能盡內政外交正確領導的責任，不問他是左靠蘇俄或是右倚日本。

二，和議的前提，和議不是隨便就可以開的。和議的前提，一個是日本有放棄侵

零主義的誠意，誠意的表現是停戰撤兵。一個是中國方面脫離外來的誘惑並冷靜內在的高調。所謂外來的誘惑即指蘇俄幾個月或一年半以後出兵的無稽的傳聞。所謂內在的高調，尤指所謂「寧可亡國，不可丟人」的說話。須知今日中國不可亡。國亡以後，再沒有光復故物的可能性。須知今日我們沒有寧可亡國的權利，我們沒有權利斷送子孫萬代的自由。

三，和議與英美法各友邦，中日兩國的和議是在日本軍隊佔領重要的都市以後開始。這些都市與英美法各國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英美法各友國對於和議是很注意的。倘使中國因和議而損害各友邦的利益，必然引起各友邦的對抗。並且，倘如中國因和議而脫離各友邦政治經濟關係，則今後中國即淪為日本的附庸。必不能保持國家生存與主權行政的完整。所以中日的和議，應當尊重各友邦的利益。並且，在和平恢復時期，以中國為中心的太平洋國際各種問題，應由太平洋有直接關係的各國共同會商解決的方案。正好像普法講和以後，歐洲的國際問題由維也納會議解決是一樣的。

四，和議的條件 和議的條件有一個根本的大原則，就是中國在和平恢復以後，

主權與行政是完全無缺的。中國的抗戰是爲了國家生存與獨立。抗戰而敗，固不能保持國家的生存獨立，和議而敗，也不能保持國家生存獨立。現在，戰爭已顯然不能恢復國家的生存與獨立了，不得已而和，倘使和又不能恢復國家的生存與獨立，當然還不如一戰。和戰的關鍵全在於國家生存與獨立可不可以保持，正如汪先生艷電所明白昭示，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在原則上可以接受，再加以日本普遍迅速的撤兵，與放棄侵華侮華的傳統思想，這樣，當然可以保持國家生存與獨立也就是說中日之間可以和平了。

如果以上四項原則都可以實現，中日的和平可以恢復，中日的合作可以實現，而有大貢獻于世界的和平。如果四項原則不能實現，中日之間當然沒有和平之可言。一答問」的意思就是依據這幾項原則而來的。

(二十八年一月卅一日南華日報社論)



和議與統一

流沙

抗戰以前，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攘外以安內』，其註脚是：『你再不抗戰，我就要搗亂了。』抗戰以來，畧畧有了改變，叫做『統一抗戰到底』，其註脚是『你如果講和，我就要分裂了。』歸根還是那一套打算，皇帝如果做不成，索性殺盡百姓吧。

也有一批青年人，的確是對革命懷有好意的。他們以為：中日戰爭起來，就會激發中國與日本的革命，再如果世界大戰起來，世界革命的僵局就會打開了。這種想法是很錯誤的。列寧曾經指出：俄國如果沒有社會民主工黨的歷史基礎，一九〇五年革命將依然不能起來，雖然有了一次日俄戰爭；又如果沒有一九〇五年以來革命經驗與一九一一年以後那幾年經濟景氣的上昇所培養出來的新的工人運動的高漲，那麼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將依然不能起來，雖然遭受了如此嚴重的大戰危機。危機可以說是客觀的革命形勢，但沒有主觀的革命力量，還是不能作成革命高潮的。列寧估計革命高

潮的條件是：一，統治階級的沒落；二，普遍的不穩形勢；三，一個具有鬥爭經驗與鬥爭基礎的革命政黨。如果缺乏了第三個條件，統治階級的沒落倒反可以利用戰爭的危機，而以軍事獨裁或法西斯來獲得再穩定；普遍的不穩形勢所引起的小資產階級與農民的徬徨，可以轉了過去成爲軍事獨裁或法西斯的工具。

依據這一理論，就能明白：一，我們不能那麼輕狂的盼望日本在今天或在明天就會革命。我們倒是要注意兩樁事實：其一，林銑內閣時代日本統治階級的動搖，戰時的軍事獨裁反而使它得到了相對的穩定；其二，戰爭在日本所引起的普遍的不穩形勢，徬徨了一陣之後，在最近一個月前，社會大眾黨終於因爲無所附着，而發表了改組爲法西斯新黨的宣言。二，照現在這樣子，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起來，中國以其半殖民地的身分，將只有更加因爲處在世界殖民地再分割戰爭的夾縫中，而被擠死。三，至於想利用抗戰來激發中國的革命，那就首先要認清誰是革命誰是反動。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國民黨的評價，是完全不合邏輯的。他們說，國民黨在準備抗戰的時候是革命的，抗戰起來之後，國民黨便成了革命的，現在如果和了下來，國民黨就會又是

反革命的。這簡直是玩笑。不管共產黨的立場如何，如果它是具有一點嚴肅性的政黨，它對國民黨過去的準備抗戰，頂多只能說：不是這樣準備法，或者說：國民黨根本不配做這種準備工作，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抗戰可以不要有準備，應當『即刻抗戰』。抗戰起來之後，我們也並不喜歡共產黨人的面諛，說國民黨一變而為革命了。國民黨究竟如何，自有其數十年來一貫之史實與其政治綱領之整個體系作客觀的證明，不能截取抗戰這一節來單獨評價，我們也不接受共產黨人的指摘，以為和了下來國民黨就又一變而為反革命，除非他們拿得出嚴肅的理由與事實，證明國民黨的抗戰也是反革命的。因為：戰與和在政策上雖不是同一物，但兩者都是國民黨的建國大業的派生物，政策可以改變，立場還是一貫的。

依照這種邏輯，共產黨人的面諛，國民黨的地位固然不因之而提高；而其所指摘，也一點都不能證明國民黨是代表反動的統治階級。那麼，誰是想利用抗戰來打擊國民黨，打擊國民黨的政權，他便是喪心病狂。我們可以這樣說：誰要是徹底擁護國民黨的抗戰政策，他就同樣的應當徹底的擁護國民黨的和平政策，否則便是欺騙，便是

陰謀。對於只知玩弄欺騙與陰謀的搗亂份子，例如中國共產黨人，我們不必再和他們作政治邏輯的爭論，我們只需考察他們搗亂能力如何，並且會搗亂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對共產黨警戒，但也毋須替它誇張。共產黨拿得出什麼進步的辦法呢？沒有。它拿不出進步的辦法，便不能握有本實力。他們不過是流氓。流氓無論如何兇相。他的本領只能在躲避警察或依附警察的場所行使。他們在西班牙的兄弟黨，並沒有較之阿比西尼亞皇帝的更進步的戰畧，甚至在勞工法令，土地法令，軍隊編制，保護教堂，及後方戒嚴條例上頭，共產黨政府軍和弗朗哥的國民軍之間，簡直沒有一點分別。我們要是希望中國共產黨會給我們創造出一個新的抗戰規模，那是做夢。可是，西班牙和法國的共產黨固然不能從進步的行動中來發展自己，但他們都掠有時代的遺產，這種遺產，在西班牙是一九三一至三六年的階級鬭爭高潮，在法國是一九三四至三六年的階級鬭爭高潮。雖然他們很快的把這種遺產化光了，但他們的確顯赫過一個時期。可是中國共產黨就沒有這樣的好運氣，它從北伐之役掠得的一部份革命遺產，早已化費得乾乾淨淨，一直到了抗戰前夕，它是在衰頹中。抗戰以來，它雖然收

羅了若干軍隊，它的政治基礎却依然一點都建立不起來。自然，它頗有了一些啦啦隊，但球員不行，啦啦隊還是着力不得。在法國和西班牙，啦啦隊的氣餒至今還沒有過去，然而共產黨早已下葬了。中國共產黨現在已日益成爲軍閥，這不是它的發展，而其它的沒落。廿多年以來，就一般的趨勢說，軍閥的全體系是在衰亡中，加了一個共產黨進去，也還是不能挽救這種衰亡的。共產黨現在生怕國民黨要和，可是，從各種條件看來，它依然沒有力量阻止國民黨進行和議。

我們還應當指出，和議不過是核算戰爭的果實，我們想要和議少吃虧，不能僅僅從避免和議來達到，更主要的還應當從抗戰本身的合理化中來達到。如果只知道以無底的抗戰來支持空虛，不問持久戰的勝負前途，甚至連僅僅是『持久』的條件都不敢正視，這就不但是冒險，簡直是罪惡了。同時，我們要想和議不至于分裂，也不能從避免和議來達到，更主要的還應當從糾正抗戰以來所謂合作的內容來達到，如果共產黨怕國民黨要和，而歌頌抗戰；國民黨因爲怕共產黨要分裂，而迴避和議；這樣子一邊是面諛，一邊是遷就，不但和不成，戰也戰不好。這樣子的持久戰並不能消弭分裂，

倒是在醞釀更大的分裂。現在的情形已經變為：以持久抗戰來保持統一，結果將是：國家的元氣斷喪得愈利害，作亂的環境便愈成熟。



國民黨切勿自暴自棄

流沙

國民黨今日應和，猶昔俄國布爾什維克之應和。列寧對布列斯特和約之解釋是：如果和德國火拼下去，俄國不一定亡，但共產黨的政權則必亡。我們現在如果再和日本火拼下去，中國也不一定亡，但國民黨的政權則必亡。

這是不是說黨的存亡可以和國家的存亡分開呢？不是的。俄國雖然吃虧，只要列寧的共產黨政權存在，便有翻身的希望；中國雖然吃點虧，只要國民黨政權存在，也便有翻身的希望。這不是說黨的命運可以和國家的命運分開，而是因為國家的命運寄託在一個革命的黨的命運上。

誰如果以為我們的這個比擬是不倫不類，那麼他就首先應該證明國民黨不是一個革命的黨，國民黨的政權不比得當時俄國共產黨的政權，中國倒是要國民黨的政權坍塌，國家纔會得救。

然而即使是共產黨人都承認國民黨是革命的黨，即使是共產黨人都賭咒說要徹底

的爲三民主義而奮鬥，一直到建國完成。如此說來，國民黨的命運應當被關心于國家的命運的人們所愛護，所珍惜，便無可懷疑了。

如果共產黨六中全會及其領袖們的這種賭咒只是說謊，那麼我們要嚴肅地指出，中國的命運無論如何總不會由這一羣說謊者來負擔。國民黨的政權將不因這一羣說謊者的如何評價而有絲毫損益。

國民黨有它的主義與政綱，和戰則只是政策，戰了起來，國民黨並不改變了它的立場；和了下來，國民黨也仍然是國民黨。擁護和，或者擁護戰，首先都應當認識國民黨完整體系。我們不需要盲從，更無須平掩蔽自己。我們不怕鬥爭，我們要對羣衆解釋。如果共產黨面諛國民黨，國民黨逢迎共產黨，這在共產黨是喪失政黨的道德，在國民黨是喪失政黨的自信，國民黨不應當把自己看成小孩子。自暴自棄；該戰則戰，該和則和，戰不是爲了取悅於人，和也無所用其忌諱。形勢很分明，現在共產黨還要面諛國民黨，這就是還不夠力量與國民黨競爭，國民黨還有充分的選擇和戰的自由。如果再逢迎下去，將來便只好把和戰之權送給共產黨，這種轉變無雖等到共產黨奪

取政權之後，只要共產黨獲得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地位，那時候問題就會比現在複雜到百倍。有人顧慮，和了下來便會引致國內分裂。我們的看法却是這樣：現在來和，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分裂與否與分裂的程度，並非僅僅取決于利害的衝突與否與衝突的程度，更主要地却是取決于現成諸政治勢力的對比。現在國民黨以外的政治勢力還沒有一個能取得壓倒的優勢，甚至僅僅牽制國民黨都還做不到，要是國民黨能夠認清其自己的地位，採取斷然手段的話。如果延宕下去，等到將來再和，那麼，分裂就會難免，而且分裂的程度一定比現在更尖銳，更弄到不可收拾。我們還應當指出，再戰下去，一到共產黨的勢力成長，不但和會分裂，就是戰也會分裂，因為共產黨有和國民黨不同的戰法。

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和各國的共產黨一樣，已經把無產階級的要求拋棄得乾乾淨淨，因而也失去了無產階級的支持，這固然是事實，但這不是說它就沒有能力去做官僚鬭爭，玩弄火器，趁着亂子來一幕宮庭政變，或者來流氓暴動，一個革命的政黨，僅僅利用客觀環境的混亂來篡奪政權，這在歷史上却完全是可能的。國

民黨必須現在就斷然進行和議，纔能少鬧亂子。

這一個月來，中央忽而放出和平空氣，忽而又說要抗戰下去，而且此後還將翻來覆去之不已。對於這種莫明其妙的表情，我們要勸告中央，一，如果這是因為中央明白了這非和不可，然而又怕和了會分裂，所以弄到如此吞吞吐吐，那麼我們已經在上面指出現在來和正是避免分裂的最後時機。二，如果這是因為中央覺得一面言戰，以安慰好戰者之心，一面又言和，以安慰欲和者之心，如此可以持平運用，那麼我們應當指出，這樣子來玩弄矛盾，就是掘毀國民黨政權的基地。三，如果這是因為中央看到了海南島事件，會引起列強與日本之間的武裝衝突，所以又要看看機會，那麼我們要在這裏重複說明，列強與日本之間的衝突，我們不能利用之以為抗戰的助力，而是只能利用之以為外交的助力，這次海南島事件也並不能變更這個規律。四，如果中央的和平表示是因為重慶各方面及各地主和的願望已無可阻塞，遮掩不住而終於洩漏了一點出來，那麼我們將嚴正的表示，中央應當以多數的意旨為意旨，多數人要的就應當和。

評五中全會宣言

流沙

關於外交部份

五中全會宣言關於我國今後外交方針之言曰：

『最近國聯行政院一月十九日之決議，復邀請與遠東時局有關各國，相互協商，俾採取有效措置，予吾國以援助，而美國總統羅斯福，同於此際，力持九國公約對□日作堅決之警告，英法繼起共維斯約。此其目的，不獨在制止□日之侵略，亦實在于消弭一切破壞世界和平之慘禍。吾國處艱危之際，對此扶顛持危之高誼，固深感不忘；亦確信吾中華民族竭盡其維護公理正義之精誠所貢獻于人類文明，世界和平之前途者，必足以副各邦之厚望。』

又云：『今美總統特舉九國公約，號召世界，維護公約，以資恢復東亞和平，而……九國公約之大原則有二，一為尊重中國主權領土行政之完整，二為門戶開放與機會之均等……開放中國實業，更足確信吾國民不獨贊助門戶開放之原則，亦且願以公

平互助之原則，與世界各國作互助和平之合作』。

又云：『深信吾國此次抗戰之結果，必能恢復我國主權領土及行政之完整，必能重振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權威。豈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得以實行，我總理二十年前建議于世界，以國際和平之結合，共同開發中國實業之偉大計劃，亦于是得以實現。』

以上部份顯係對英美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及今年一月十四日之致日牒文，建議以國際會議為調停形式而發，如汪先生所說：『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者。而宣言中所希望之制裁，與所謂援助，僅求其能于調停中行使，則與汪先生之觀點又正相同，即『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于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用于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這個意見，已為宣言所隱含，可惜他們不敢正面的對着現實，坦白接受。

于此，我們有一點要指正，又有一點要補充。

要指正的是：宣言既表示響應英美致日牒文的調停建議，並在原則上提出我方所

能接受之程度，是則並非反對和議，且已準備參加調停，實為對汪先生電建議之採納，汪先生電建議前有臨全大會宣言以為根據，今又獲得五中全會之認可，此誠黨國之幸。惟于所謂中央執監會開除汪先生黨籍，及中宣部對汪先生之誣蔑，猶不加以糾正，此實使人大惑不解者。五中全會宣言既已把『主和即漢奸』一語作了最有力的翻案，而猶不替汪先生辯正，此種不光明態度，將何以取信於國人？

要補充的是：我們不但主張響應英美致日牒文而且主張對近衛聲明，我方亦應答以聲明。直接交涉與平行調停必須交互為用，始能把握當前外交形勢，而得運用之宜。日本最近表示將對英美作直接談判，要求取消一切束縛中國之條約，開放世界原料市場，及廢止一切經濟集團，關稅壁壘，及人口分配額限制等，且謂此項建議如被接納，則「日滿支」經濟獨佔及「日滿支」共同國防之活動可以作罷。（見路透社卅一月東京英文稿）。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平沼較之近衛，在和議方針上，還有更值得我們注意之點。

日本在遠東迄未能建立其霸主的地位。以前她是英國的副手，今後她將是美國的

副手。不久以前，她還在想和英國妥協，然而最近經已看到將來在二次大戰中有力量威脅日本者不是英國而是美國和蘇聯。日本要想利用英國牽制美國，利用德意牽制蘇聯，以求解除此種威脅，實爲不可能，反而要受連累。故改變方針，情願投到美國的旗幟下，做她在遠東的副手，一如過去英日關係。美日之間此種新的關係如能確立，日蘇之間的不侵犯，也就連帶得到保證。須知日本對付日益逼近的危機，取的是守勢，不是攻勢，而其和議方針，亦即以此爲出發點，前幾天日本駐歐各國使節召開會議，主張改變一般對外關係，反對以日德意防共同盟爲支持物者，居然頗佔優勢，尤爲一有力之佐証。

日美日蘇關係果能做到這一層，則日本原來所急於實現的中日防共同盟在軍事上的意義，亦即因而消失，願意作罷，亦在情理之內。至就經濟方面，列強在華特權果能取消，日本即不另有要求，亦已有利，因爲日本商品在東方固具有極大競爭能力，無須堅持獨占。日本的商品，美國的資本，將因在華門戶開放而各得其所，尤爲日美諒解的交點之一。說到開放世界市場，原爲渥太華會議以後日美對英的共同要求，雖

然還沒有過以共同的形式平行提出。過去日英之間曾爲此單獨訂過商務協定，然而問題並不全部解決；不久以前英美之間也曾爲此單獨訂過商務協定，然而問題也並不就此全部解決。這次日本如果提出關於世界市場的建議，不但失之於此者可以收之於彼，放低對華的經濟要求，而在世界市場上取得報價，並且依據這一點，日美之間還可以建立更大的共同點。日本看待這次中日事件，並非死死拿它當作問中國要東西的手段，同時還拿它當作問第三者要東西的手段。這裡就有不少活動做法與轉移的餘地。

我們考慮這種形勢的複雜內容，認爲必須中日直接交涉與參加英美的平行調停，不能偏執其一，而是應該相輔行之，謀全面的運用，力求轉移損失。和議如果到來，不管其形式爲平行調停或個別交涉，事實將爲：在某幾點上，英美將一致對日；在某幾點上，日本將特別對美默契以對英，或英國特別對日默契以對美；在某幾點上，日本將挾英美以臨華，而在某幾點上，則日本又將親華以圖制止英美之過高要求。凡此複雜形勢，我方必須拋棄成見，始能左右逢源，影而其間諸勢力之分流與合流。必須如此，中國的地位纔能在交涉中表現其爲具有決定作用的有力因素之一。而不致于如

鄉下人吃講茶，成爲傻瓜。

五中全會宣言的缺點，就在于忽畧了這種外交的活潑機能，死死靠住一邊，一切聽命于平行調停，這是一幕笨的做法。

所以我們主張，在參加和平調停之外，還須同時進行直接交涉。對英美致日牒文我方既答以聲明，對近衛聲明或對將來平沼致英美覆牒，我方亦應答以聲明，以爲和議之開始。

和議的時機與和議的運用

流沙

爲什麼非和不可呢？說和，也何必這樣着急呢？現在正有不少人在這樣懷疑。

這樣懷疑的人，是比較平心靜氣，肯想一想的；但他們不能把所想的寫出來，誰要是對汪先生的主張作一番理智的攷察，就有被罵爲『汪派』的危險。這裏，我要把從私人談話中所聽到的，做一個公開的討論。

他們說：再戰下去果然沒有把握，但沒有把握不僅是現在，不僅是今後；在開始的時候也何嘗有過把握。過去既然可以沒有把握而打起來，今後爲什麼就因爲沒有把握而不可以打下去呢？

他們又說：要和，果然是終有一天要和的，但何必這樣着急。當近衛發表聲明時，中國來響應一下，還有可說，但現在已經事過境遷了，現在英美日還在那裏攪不清楚，中國要和，就和得成嗎？

所以，還是聽其自然吧。已經在打，就打下去再說。爲什麼非和不可？爲什麼這

樣着急要和？

這種說法，可謂老實，然而是不負責任。我們對於這種說法的解答是這樣——

當初我們要不要打的決定，果然不以有無把握為前提，而以是否到了最後關頭為前提。所謂最後關頭，不是一條呆板的界線，而是說我們的外交手段已經用盡了沒有。英法和德意商量好了，阿比西尼亞便打了起來，西班牙便打了起來，德意商量好了，奧大利便亡了國也不抵抗，英德商量好了，捷克便被割去了一半也不抵抗。像她們那樣，是無所謂自己的最後關頭的。我們再來看看中國：戰前中日交涉停頓了一年多，一切交給英日倫敦談判去作主，倫敦談判在六月二十五日提交英下院時成了僵局，七月七日便來了蘆溝橋事變，倫敦談判在七月二十八日英國致日照會中宣佈了破裂，八月十三日便有了上海的戰爭，此後就這樣子打了下去。這一段史實可以分兩方面來考察；其一，如果此外並無別情，當時我們連對如此重大的事件都不敢作主，在外交上完全自安于半殖民地的被動地位，那當然是不對，其二，如果當時我們確曾用盡了自主外交的最大努力，日本還是不願意找中國說話，就打了過來，我們當然除了抗戰

沒有第二條路。沒有把握也只好打，這一段史實，將來還應加以考訂。這裏我們只是要指出，抗戰乃是不得已的手段，也是最後的手段，不是說頭痛起來，打打也好。

如果我們當時的發動抗戰，是因為英美日本在遠東的勢力均衡已經破裂，不得不以戰爭來創造新的外交基地，那麼，到了這種勢力對比的新的均衡已在形成中，新的外交基地已在出現中的今天，我們中國人替中國的利益打算，就應當運用這種形勢，由戰爭的軌道走上外交的軌道。七七事變與八一三事變當時，我們從英美那裏得不到一點線索，（七七事變後六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對新聞記者宣稱：『十二日接到英外相艾登關於華北事變的通告，美國政府對該通告已經諒解，但現在不擬採取何種行動』。八一三事變之後差不多三個月，在比京會議席上美國代表台維斯表示當時還不必急急于以停戰為第一義）到了現在，英美則已明白提出她們的調停方案（去年十二月卅一日的美國致日牒文，及今年一月十四日的英國致日牒文，一致主張以國際會議的形式來調停。前昨香港滙豐銀行年會主席的報告，說以調停來結束中日戰爭，今後再不能錯過機會，這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再則，如果說七七事變與八一三事變當時

，日本不願意找中國說話，那麼，在去年十一月三日近衛的談話及十二月廿一日近衛的聲明發表之後，總算是有話可以商量的了。

如果過去是因爲失去了外交的基地，我們纔逼得沒有把握也只好打起來；那麼，現在經已出現了新的外交基地，我們爲什麼沒有把握也還要打下去？如果過去是因爲我們自安於半殖民地的被動外交的緣故，一看到英日之間無法安排，我們就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尋尋門路，來選擇自己的命運，因而打了起來；那麼，我們在受了這一番痛苦的經驗，受了這一番歷史的教訓之後，我們總應當醒悟，總應當知道自己來選擇結束抗戰的時機。過去我們被動的拿英日倫敦談判的決裂作爲我們的和平的最後關頭，現在我們難道還要同樣被動的拿國際調停會議的召開日期作爲我們的抗戰的最後關頭嗎？我們毋須誇大，我們深知中國的對外關係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擺脫其半殖民地

的被動地位，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掙脫英美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十分鉅大的，要想掙脫這種影響，不能僅僅從外交的運用中去達到，更主要的還是要靠革命來達到。但我們總應當把自己一點微薄的力量用在最適當的地方，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主動。

在遠東國際勢力的對比中，中國無論如何不失其爲法碼之一，雖然它只有銖兩之重。當英美日的三角勢力對比成爲極大的剪刀差時中國這個法碼無論投在天秤盤的那一邊，其作用是看不見的。但當兩邊的重量是在對等的，動盪不定的剎那間，這一銖兩之重的法碼却操有舉足輕重之權。拿實例來說：歐戰以前，遠東的均勢是建立在英國的支配上，這種支配的強力使得日本只好做她的副手，使得美國要扳也扳不過來。在當時的這種形勢之下，中國這一個法碼便起不了作用；無論它是投在那一邊，都改不了現成的勢力對比。歐戰一起，英日美在遠東這三條力的線起了震動，其時日本國內頗有人主張與中國合作從白種人手上收復太平洋，這是日本人第一次認識中國這一個法碼的作用。而孫中山先生也以反對參戰與倡導大亞細亞主義以爲響應，這是中國人自己第一次認識中國這個法碼的作用。假使這個計劃能夠實現，中國利用日本的力去收回外人在華特殊利益，而以此收回利益之一部份報酬日本，這在中國還是合算的。但要實現這個計劃，在日本需要更大的魄力，在中國需要更大的政治人才。這是一個新局面的創造，光是知道從中國身上打點小主意者不足以語此，光是知道媚日以

求苟安者也不足以語此。當然，這個計劃之終于流產，它的客觀原因比它的主觀原因還更值得我們探討，但這個探討在這裡只好暫且放開。在這裡，我們只是要指出在某種形勢變動之際，中國在遠東均勢的改造中，是可以作為決定的因素之一的。歐戰結束之後，英國在遠東的支配地位和她在全世界各地的支配地位，一同低跌了下來。而美國和日本這兩條力的線，却在這方面升了上來。英日美這三條力的線在向「平行」接近中。這種向「平行」接近，正是新舊均勢交替中的過渡現象。在華盛頓會議席上，美國認識了中國這個法碼的作用，她所倡導的九國公約，就是要想利用中國作為她在遠東霸權的支點，如同已往英國利用日本作為她在遠東霸權的支點一樣。九國公約的規模是製造美國人的太平洋，而其手段則為扶植中國。但華盛頓會議時的形勢，只是歐戰所作成的遠東均勢變動的記錄與核算，九國公約的實施還需要更大的變動做前提。其在中國，光知道問那一個借錢更方便的市僧，當然也不配在這樣一個大題目上頭去講求怎樣運用對美的新關係。因此，九國公約事實上也還表現不出什麼。

以上雖然是過去的事情，但都是寶貴的經驗，它告訴我們，從歐戰時期開始，遠

東的國際均勢已經在破裂中，已經在醞釀一幅新的圖案，而在這新舊交替的過渡當中，中國這個法碼應當可以有某種決定的作用。要發揮這種作用來選擇自己的命運，中國應當有她的自主外交。一直到現在遠東的形勢變動，不過是繼續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二一年開始的兩大主潮的方向：其一是日本的亞細亞圖案，其一是美國的太平洋圖案。就中國的現有地位而言，她要想堵截這兩大主潮的方向是不可能的，但她可以，並且應當利用這兩大主潮的方向，使之爲害較小，或使之有利于我。戰後英國在遠東的地位是退守的，日本與美國則都在進取中。退守者不能爲害於己，但要防她以中國爲犧牲。進取者要防她以中國爲對象，但也可以利用之以創造於中國有利的環境。這裡我們還需要作進一步的攷察，即我們需要把日本與美國這兩種進取的力量加以嚴格的分別。日本和德意一樣，她的力量足以破壞舊環境，但不足以建設新環境。意大利破壞了阿比西尼亞與西班牙，但還是不能夠建設新的地中海。德國破壞了奧大利與捷克，但還是不能夠建設新的多瑙河流域。怎樣利用意大利與德國，現代波蘭的外交是一個但型。波蘭的作風有它的成就，也有它的限度。中國利用日本，也只能做到波蘭現在

的成就，不能做到土耳其過去的成就。但這已經是值得寶貴的。這種成就，至少使波蘭緩和了德國的侵畧，并且利用之以提高波蘭對英法的身份。我們對日本，爲什麼不可以這樣做？至於美國，她剛好和日本相反。美國沒有直接破壞遠東舊均勢的條件，但她具有締設新均勢的條件。這樣，我們不但應當重新攷訂對日關係還應當重新攷訂對美關係。我們早就應當把中日關係作成德波關係那樣，使中國處在退守與進攻的兩大勢力之間不至於被擠死，不至於成爲進攻者的對象，退守者的犧牲。我們應當把中美關係做成戰後那幾年的土法關係那樣，使中國得以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完成其獨立。

這次中日戰爭不過是廿多年來英日美在遠東的勢力均衡的破裂之繼承與擴大，我們的應付還是應當以上述原則爲基本方針。日本在以武力破壞了遠東的舊均勢之後，現在輪到要建設新均勢了。這新均勢，在日本人說起來，也就是所謂「東亞新秩序」。這裡，她就需要和英美辦交涉。交涉的困難，使她覺悟到拉攏中國的必要。她要是能夠以某種寬大的代價在某幾點上取得中國的默契，她就可持之以臨英美，失之於此，收之於彼，這在她還是合算的。日本最感到困難的是，中國死死的跟住英國走，英

國又跟住美國走，這樣子，如果開起國際調停會議來，就會變成二對一，日本落於完全孤立的地位。所以她要反對這種國際調停會議。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來，美國雖然和英國採取平行的態度，但美國以九國公約來收拾局面的計劃，不但和日本有其分歧，即和英國，也依然有其分歧，美國利用英國的合作以對付日本，及時還須利用中國的合作以對付英日。利用中國的合作，這是美國草創九國公約以來建設太平洋霸權的支點，現在依然沒有變動。至於英國，她在這方面是退守者，她之利用美國以對日，毋寧說是她為美國所利用。英國在這場交涉中之所以還能夠保持相當地位，毋寧說是因為她和英國之間還有分歧，並且她還具有投資的力量，這纔為日本所重視；而且，英國還因為幸而有一個中國死死的跟着她走，藉以保持其主人的身份，這纔為美國所重視。現在的情形是：日本、美國、英國，他們都想利用中國這一個法碼，拉之加入自己這一邊，藉以決定在交涉中三者的勢力對比。

中國應當如何呢？這裏我們不妨再參攷一下日本的對策。日本是想取得中國的諒解以對付英美，至少是在某幾點上；而且，她還想成立日英單獨諒解以對美，或成立

日美單獨諒解以對英，至少是在某幾點上。要是這個能夠辦到，那麼，即使形式上是採取國際會議來調停，實際上還是由直接交涉與個別交涉來決定，這就是於日本有利。至於我們，自然也應當學點乖巧，我們應當運用對日直接交涉以臨英美，同時運用國際調停以臨日本；即如對英對美，我們也應當善于運用她們的合作，同時善于運用她們之間的分歧，中國運用對日直接交涉，正可以促成國際調停會議的召開；而運用個別的對英對美交涉，則正可以決定國際調停會議的性質，國際會議與直接交涉之間的重心，與夫國際會議自身的重心，現在正有待於中國這個法碼的投入而決定。這正是中國運用自主外交的契機，我們主張爭取主動的和，其意義亦即在此，五中全會宣言發表以來，繼之以重慶官方的談話，中央等待國際調停會議的召開，可謂望眼欲穿，但這種等待就是不得法，這種等待只有使我們落入不戰不和的僵局，一切聽命于別人。

過去，我們沒有把握也打了起來，這還可以說是死裏逃生；現在却不應該沒有把握再打下去。一年多的抗戰居然打出了新外交基地，使得日本急于要找中國說話，使

得英美深恐中國對日直接交涉，這在無形中已經提高了中國的身份。這種新的外交基地的出現，也就是汪先生所說『即抗戰之目的已達』。現在的課題在如何運用此新的外交基地。首先我們根據上面的一串分析，應當認識此新的外交基地乃如汪先生所說只能利用之以取得比較有利的和平，不可能拿它來做無底抗戰的憑藉。其次，我們還應當指出：這種新的外交基地是有時間性的，我們如果不能及時運用，一任英美日這三條力的線在那裏自升自降，等到他們之間最後作成了均衡，作成了和局的時候，我們現在的這個新的外交基地便會消失，我們一年多來的抗戰便完全為傀儡戲，什麼意義也沒有了。在這種轉捩的關頭，誰還在那裡說『抗戰沒有把握，現在也打下去再說』，這乃是無可饒恕的罪惡。

現在這種時機還沒有過去，我們還來得及運用自主的外交，來爭取主動的和。近衛雖然下台，但日本目前的處境還不許可她變動近衛聲明的原則，這個原則不但是為平沼，板垣，與本屆議會所承認遵守，更主要的還是因為這個原則乃是在歐戰時期即有其胚胎，而為這次一年多來的中日戰爭的痛苦經驗所培養長大的。以所，誰要是說

近衛聲明已成過去，可以不必再去想它了，這便是不明白過去的歷史背境與當前的形勢。我們自然更不應當那樣想，以為英美日還在那裡攪不清楚，中國還是聽其自然，打下去再說。那樣的想法便是從走頭無路自暴自棄的劣根性而來的。我們現在並非走頭無路，為什麼要自暴自棄？

我們應當捉住當前的時機，爭取主動的和局。

（以下文字因模糊及水漬，內容難以辨識，僅能辨認出部分詞句如：「我們應當」、「爭取主動的和局」、「英美日」、「中國」、「時機」等。）

結束中日戰爭與常識

沉觀

「怎樣可以結束中日的戰爭」？這個問題，除了一般麻木和虛矯，或者別有用心的人們以外，我想凡中日兩方有遠識的人士，沒有一天不在腦內盤旋百數十次。

現在抗戰已到了十八個月，我們迴想盧溝橋事變的當時，兩方都不想戰而畢竟戰起來，兩方都想趕快結束而無法收拾，其最大原因都根於大家不肯運用常識。

在日本方面的估算，最初以為中國是可以不戰而屈的，及孫連仲等部隊越過黃河以北，這個估算是錯誤了，其後日本軍隊攻南苑，仍想就地以地方事件解決的，上海戰事一起，這個估算是錯誤了。又其後以為南京攻下，中國即可議和，然而中國願和是在南京陷落之前，而不在南京陷落之後，日本這個估算又錯誤了，至於今日則兵連禍結，欲罷不能，為什麼如此？祇為日本方面不肯運用常識。

在中國方面的估算，最初以為日本祇是威嚇，不敢用兵，及北平陷後，這個估算是錯誤了。其後以為蘇俄斷不至於坐視北方的淪陷，察綏失落，蘇俄這不會參戰嗎？

然而這個估算是錯誤了。又其後以爲英美等國在長江流域利益很大，上海失落，英美最少亦應以武力干涉。然而這個估算又錯誤了。至於今日則外援無望，獨力支持，爲什麼如此？也祇爲我們太不肯運用常識。

前年八月開戰之時，南京政府中人已有『糊裡糊塗打起來，拖泥帶水打下去』之說，一個國家的生死安危寄於糊裡糊塗拖泥帶水的辦法中，我們實不禁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之感，但這種現象豈止中國如此，日本的當時現象，也何嘗不如此？

現在中日的朝野沒有一個不渴望和平，祇是在宣傳方面，日本依然以戰勝者自居而中國不肯以戰敗者自待，因此日本方面固然要趕快和平，但對於議會，對於民衆，不能不拿戰勝者的口吻，以強調爲敷衍之具，而在中國方面呢，同樣的要趕快和平，但對於黨員，對於民衆，不能不拿最後勝利的口吻，以高調爲粉飾的法門。其原因安在？因爲兩方都要在未議和之前，安民心，振士氣，兩方未嘗無遠識之士，然而大家依舊尙未肯徹底運用他們的常識。

我以爲中日要結束戰事，大家應該排除客氣，運用常識，在今日世界除非極野蠻

的民族可以被夷作殖民地之外，實在沒有什麼戰勝國，也沒有戰敗國。戰勝國的命運未必優於戰敗國，我們細察歐戰終局，應可恍然。今日中日戰爭已一年有多，我們推勘一年來的事實，可以肯定中國不會倖勝，中國也不會覆亡，我們應該根據這兩件事實，使普遍的中日兩國人士盡量運用其常識，以期結束這次不幸的戰事。

怎樣說中國不會倖勝？說起來似乎被人詆為戰敗者的心理。但我們要體察開戰十八個月，也失了冀，察，綏，魯，晉，汴，鄂，蘇，浙，粵，皖，十幾省的省會，其餘平，津，滬，青島，漢口幾個重要市區不在內。固然我們可以解釋，日本雖然佔了點和線，但全面究竟在於我們手中。但是自古軍事的失敗，首先是失了點和線，如果失了點和線而不算敗，則今日普遍殖民地還是完整的國家，因為他們所被佔據的都是點和線，而不是全面。不但如此，縱使有最好軍隊，凡守一城市，不能說他據守該地可以永遠不拔，只依軍隊的質量，稍能延長時間。因此我們應該自省，我們的戰爭準備，還沒有到成熟時期。全國的人民究竟沒有完全無缺的訓練。就此情形而論，縱使今日有了外援，而又是軍事的外援，有無勝算，尚不可知。何況今日我們擺在眼前的

事實，軍事外援爲必無之事，這樣每天宣傳殲□若干，每次失地亦同爲比例。自然我們軍隊目前還有後路可退，但戰區的人民困苦顛連，并非我們身居安全的後方和海外所可夢想的，準備不充足，人民無訓練，我們焉可以倖勝？

怎樣說中國不會覆亡？我們經革命以後，中國雖然說不上已組成一個近代國家，但已踏上近代國家的路上。民族意識和思想已深入一般人心。在宋明時代，人民只知道換朝，而今日則無人不知亡國的慘痛。日本方面不能說佔據某地即可控制一般人民，民族意識的潛在，即可以爲復興民族的張本。不但如此，以日本的兵力控制中國，點線或有餘，而用以應付列強則不足。自然我們不願學一般預言家以爲世界大戰即在目前，但萬一事變來臨，日本能否以其十分之六的餘力（我們估算日本已用十分之四的力量於中國）來應付世界急變，殊爲疑問。日本因此到底願意和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做朋友，抑願意和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做仇敵？我想日本比我們更明白的。

由前一個事實，我們應該反省，由後一個事實，日本應該自思。我們坦白的說，我們固不虛矯謂最後勝利屬於我們，也希望日方排除客氣不必矜誇使中國屈膝。中日

土壤相接，等於平常人家的鄰居，我們看不見鄰居可以結百世之仇，更看不見一己可以獨占無上之利。而且我們更相信，日本以朋友待中國，中國更可以朋友待日本，太平洋的風雲是不可以前知的，但終有一天變化是我們可以預測的，中國為一主權領土完整的國家，有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自由，不特可以為太平洋諸國的貢獻，更可以為世界和平的貢獻。我深望中日兩方遠識人士，排除客氣虛矯，澈底運用常識，來結束這次不幸的戰爭。



和議的可能性

君 泰

蘆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我方曾經一再申述願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國的糾紛，可見得和平原是我國一貫的外交方針。惜當時日方對於我國的認識殊欠明瞭，以爲我國絕無抵抗力量，不堪一擊，於是逕行佔領平津，調動海陸大軍，着着進迫，企圖一舉將我國併吞。我國至此乃不得不出以全面的抵抗。開戰以來，我國又曾迭向國際表示不拒絕調解之意，例如比京白魯塞爾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以及德大使陶德曼居中奔走，與夫最近國聯對於實施盟約的討論，其間我國無不聲明保持固有的立場，可以爲証。戰事延長至今，經過了十八個月，日本殆已漸次認識我國抵抗力量的不可輕侮，加以日本自身軍力資財消耗的龐大，蝮蛇吞象，有不勝負擔之苦。而列強環視，正在積極競爭擴軍，相形見絀，日本於此亦不能無懼。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推測日本確有議和的意向，決非無稽之談。由此說來：在我國，則和平原爲一貫的外交方針；在日本，則戰事有不得不速謀結束的趨勢。我們認爲和平有進行之可能，此其一。

再就抗戰的目的而言，吾人抗戰原在維護國家主權之獨立及行政之完整。依日首相近衛十二月十二日的宣言，再加以二十九日汪副總裁的通電，將來如能在和平會議上折衝得宜，則國家的獨立，仍在保持。如此則抗戰之目的已達，何必使人民作更大的犧牲。同時，日本勞師遠征，欲併吞中國，固不若其始料之易易，即在佔領區域之內，亦復統治困難，消化不得。彼此糾纏下去，共存共榮的堂皇口號恐怕要變成共亡共辱了。現在日本既有和平的表示在先，倘使我方亦有此表示，無論雙方的意見還有若干距離，而和平的希望是不能抹煞的。我們認為和議有進行之可能，此其二。

論者或謂講和必至亡國，歷史先例，或無差忒；此亦讀書不求甚解之過，其言殊與史實不符。昔太王遷岐，以緩狄人的侵犯，而周室以興，魏絳和戎，以靖西戎的禍患，而晉以復霸，即南宋的覆亡，亦並非亡於和，而亡於內政的腐敗，君臣的酣嬉。至於勾踐沼吳，完全由於勾踐的臥薪嘗胆，忍辱負重，尤其是盡人皆知的故事。遠觀西方，在上次歐洲大戰當中，若俄若德，皆以戰敗而和，然二國至今仍不失為世界第一等強國，尤為顯著之例。今日本既深知不能滅亡我國，而我國亦深知不能滅亡日本

；日本想和，我國亦不必怕和，我們認爲和議有進行的可能，此其三。

還有一層，中日兩國，彼此人民初無百世不解的冤仇。我國對於日本人民更未結怨。去年七月蔣委員長告日人書中，縷述中日兩國在歷史及地理上的關係，其結語有云：『深望諸君……發揮貴國國民正義之意志與力量，促使變更侵畧政策，恢復和平秩序，實現中日相互之親睦，奠定東亞永久之和平。』可知日方如果悔禍，則我方未嘗不可以與之言和。我們認爲和議有進行的可能，此其四。

總之，我們主張考慮和議，並不是苟延殘喘的打算，更不是力竭投降的下策。我們要從和平中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主權領土的獨立完整。此次中日戰事，開始有其不能避免的原因，結束亦有其不得不然的情勢。戰爭的開始，由於日本輕視中國的抵抗力，已如上述，現在戰爭將見結束，其原因亦由於日本已經漸次認識中國的抵抗力。故此時之和，非屈服而和，乃使戰爭對手認識自己的抵抗力而和。戰其所不得不戰，和其所不可不和，這是我們的主張。今日國人尙有以和議的可能與否爲疑慮者，是以論之如此。

和議的可能性



一個總檢討

流沙

汪先生的和平建議，反對者聚蚊成雷，第三國際指揮下的中共及圍繞在中共周圍的江湖浪人，一小部份中央同志，及英美論調，或故意歪曲，或蔽于事實，或各以其己國之立場希望中國如此如此，雜湊而成爲一片煙幕，把符呪一般恫恾的恐嚇，神志不清的夢囈，和假惺惺的慫恿，擲在中國人民的臉上。

第三國際指揮下的中共及圍繞在中共周圍的江湖浪人，他們製造農民暴動，終於被趕跑，煽動軍閥叛亂，又次次失敗，到頭抓住「抗戰就是一切」的口號，企圖混水摸魚。當我這樣說時，一定有人不以爲然。現在有一部份純潔而衝動的青年，他們以宗教式的虔誠崇拜着中共，心裡在如此想道，中共是革命的，讓它利用機會奪取政權不是好嗎？我要告訴你們，現在的第三國際及其指揮下的各地共產黨支部，早已連革命的影子都沒有，它們摸的是魚，不是革命。法國的共產黨，以及西班牙的共產黨，捷克的共產黨，所作所爲，難道還不夠作我們的借鏡嗎？而且，我還要告訴你們，革命

並不是要製造混亂，而是消滅混亂。一個革命者只能這樣說，自然我們沒有這個責任而且也沒有這個可能去幫助舊朝代消滅混亂，因為這種混亂正是舊朝代的結果；但我們也一定不製造加深這種混亂，因為我們的任務乃是要以創造新的時代來消滅這種混亂，過去孫先生創造中華民國，列寧創造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雖然走的路不同，却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明乎此，則今之企圖利用抗戰來製造混亂，以為「人民愈窮愈革命」，甚至企圖把抗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合，藉以製造更大的，經常的混亂者，乃是十足的機會主義。不管你們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你們的心地是純潔的與誠摯的，對於任何革命的這一共通的原則，我相信你們必能夠加以考慮。讓失意的政客，軍閥，失意的文丐，與喜歡做流寇的人們去聚集在中共的周圍吧，我們將嚴厲的打擊他們。而你們，純潔與誠摯的青年，却犯不着替這一批流氓的集團做貓腳爪，去火堆裏抓栗子。要為革命犧牲，首先要認清革命。

每一個純潔與誠摯的青年，都應當對於當前的和戰問題下一番理性的攷察。第三國際指揮下的中央及圍繞在中央周圍的江湖浪人，以流氓拆梢的心計來處理這一個問

題，惟恐不能借用日本的力量來消滅國民政府，惟恐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起來，惟恐中國人民還剩有一口飯吃，不肯跟他們一同去挺而走險，以遂其升官發財之大慾，並假借社會主義之名以殘殺異己，圖騙僑賴。所以他們要拿「抗戰就是一切」來作爲「抗戰到底」的註脚，使之成爲無底。每一個純潔與誠摯的青年，在攷察和戰問題之際，首先應當從這一批流氓集團的欺騙下解放出來。

至對於一部分中央同志，則我們的貢獻如下：第一，請不要把中共的力量估計得過高。事實上，中共現在並沒有工農羣衆跟他們走，跟他們走者只是一批失意的政客，軍閥，與投機的文丐，都因爲政府重視他們，恐怕得罪他們，他們這纔聲勢十倍。只要國民黨的旗幟顯明起來，並副以堅決的政策，這一羣蝗虫就會四散飛走。根據西班牙的教訓，第三國際指揮下的共產黨多囂張一分，抗戰即退後十分。中國現在無論 是戰是和，都非把這假托民意的黔驢加以清算不可。第二，請不要以爲拉攏了中共，就是取得蘇聯援助的保證。應知蘇聯今日，唯英美之馬首是瞻，不能單獨行動，她們早已好幾次聲明過了。在戰的當中，蘇聯要跟着英美，亦步亦趨，沒有單獨出兵的可

能，在和的當中，蘇聯也要跟着英美，亦步亦趨，沒有獨立談判的資格。就不說出兵，只說援助罷。這自然是我們應該努力覓取的，但這種援助，有國際外交的正軌可循，不當以中共問題來做條件。應知道中共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內綫，不是中國在蘇俄的內綫，偶一不慎，後患無窮，這其間的利害關係，是不容忽視的。第三，一部份中央同志未始不欲和，但謂近衛聲明強硬如故，毫無讓步餘地，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引倫敦太晤士報的評論來證實汪先生的見解。該評論說：

「條件中值得吾人之注意者，即讓步一事。在不久以前，日本某陸相曾宣稱，日本不能放棄一寸佔領中國之土地。今日之和平條件——至少在文字上——並未超過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爭端開始時所要求之範圍……」。

「本年（一九二八）一月十六日近衛曾宣言不再與中國政府談判，而不承認中國政府之存在；但此新條件之對象，顯係中國政府，殆無疑義」。

這裏，有人要問：那末日本不是白打，肯如此罷休？那末中國不是白打，打來打去還是接受原來的條件？關於前一句問話，我在本報社論「和與戰」已有解釋外，並

再引證上述泰晤士報評論以爲補充如下：「在戰事初起時，一般人的預料，日本佔領中國土地愈廣，其講和條件必愈苛刻。此種預料，經中國繼續抗戰，已證明其不確」。質言之，日本之肯於言和，也就是一年餘以來我們前方將士後方民衆流血流淚所換取得來的結果。

關於後一句問話，我們的答覆是這樣：我們應當記得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實際上已不以中國爲其提出條件之對象，而把條件提出於英日倫敦會議。結果倫敦會議成了僵局，這纔打了起來。如果當時倫敦會議得美國的贊同，像後來的明興會議那樣居然商量妥當了，這一場戰事能不能免掉，這且不去說它。總之經過一場創鉅痛深的戰爭，淪陷了偌大的土地，中國居然能夠在接受七七事變前夕的條件於無損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的原則之下而取得和平，於和平中收復戰爭中所失的土地，按照臨全大會宣言的精神，認爲抗戰之目的已達，自然是十分正確的。

一 個 總 檢 討

第三，一部份中央同志以七七事變前夕中國要和而不能，因爲關鍵不僅在中日之間，而且在英美之間。現在沒有得到英美的一致同意，恐怕要和也還是不可能。既然

同樣是不可能，那就只好僵持。關於這一層，我們的解釋是這樣，中日開戰前夕和開戰到現在，英美中日之間的關係已經大起變動。一則，中日戰爭本身發展的程度，以及圍繞在中日戰爭周圍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已使日本多少改變其原來對華的觀念。誠如汪先生所說，中國的困難在如何支持戰爭，而日本的困難則在如何結束戰爭，這作成了日本與中國妥協的交點。二則，抗戰前夕英國尚保持其對遠東問題獨力支配的地位，她可以作成中日間的妥協，也有力量阻塞中日間的妥協。現在呢，這一種力量被英美平分了，就再不能那麼一致。她們要想在他們所認為時機未成熟時來阻止中日間的妥協，便不及將來她們認為時機已成熟時來阻止中國繼續抗戰那樣有力。這就是說，目前我們還有多少的主動餘地。我們應該認定我們是主體，關於在華權益保障以及門戶開放諸問題，應該向我國來談，至少大家一起來談，不能任由別人來談。任由別人向日本來談中國的問題，這就等於承認了中國已在日本支配之下，他們不過從這支配中，爭回一些，均霑一些。可笑一些人看見第三國和日本算帳，一回兒軟，便愁悶起來，一回兒硬，又高興起來，簡直忘却了自己主人的地位，任憑他人排佈，還悲喜

隨之，英美現在已漸趨一致，然而分歧之點仍然不免，我們應當利用她們 分歧，同樣也可能利用她們的分歧。在對付日本，我們應當利用英美一致與日本之間的對立，在聯絡英美，我們應當利用英美自身之間的對立，甚至利用日本與英與美的對立。總之，我們現在有更多的爭取主動外交的活動範圍。三則，中日戰爭，撇不了英美的關係，中日和平，也撇不了英美的關係，這是自然的，和議果可成立，中國必然尊重第三國的權益，日本尤必須實踐其不獨佔的諾言。如此則第三國還會有什麼疑忌。

基于上述三點，我們希望中央同志能更對汪先生的建議作誠意的檢討。

至于目前英美的論調，我們可以拿兩點來代表，其一是前年比京會議時美國代表台維斯的言論。他說：「在中國政府尚未呈現崩潰的跡象之前，我們不應以停戰為第一義。」其意是說，除非中國政府完全被日本打坍，以至于美國沒有了講價的餘裕，否則美國還是願望中國以抗戰來等待，等待到她講好了價錢再來停戰。其二是泰晤士報的評論，它承認近衛聲明是和緩，但依然說：中國此時不宜接受其和平條件。一方面，它說日本之讓步是不得已，「即日人在大陸佔有之土地，其消納之能力自有其限

「度」之故；同時又說，「日方此次所提條件或非日方之真意。」既然是和緩，爲甚麼不應當接受之以爲談判基礎？既然日本是由于不得已而讓步，難道日本還有別的路可走嗎？該評論之所以要如此掩掩藏藏的說，無非是因爲下文一句：「第二特點在此條件並非向任何政府提出，而以中國爲對象」，這即是說，因爲此條件不是向英國提出，所以中國尙不應當接受。

我們自有本國的觀點，爲什麼要以他國的觀點來做我們的觀點呢。根據以上兩節的分析，我們絕不能處處惟他人之馬首是瞻。

此外尙有另一種見解，即一月十二日大公報社評「我們的和戰觀」。它要無條件的和，這一點我們經已在昨天的本報社論指出其爲無根據的幻想。它反對和平的另一理由是：因爲「認定日本沒有人能夠負起偌大的責任，與其說了不算，……何如堅持到底，倒還有勝利可期」。照這說來，彷彿日本的軍部也像中國的共產黨一樣是戰爭無底派。事實並不如此，日俄戰爭時首先主和的還是前線的將領。甚至法西斯，也不能不接受事態發展的規律的限制。在本報前幾天的社論「從近衛內閣到平沼內閣」

裡我們已經指出這次主和者事實上乃是軍部的意旨，這裡我們還可以另舉一個事實，近衛下台後第一個聲明日本此後維持近衛聲明的方針者，乃為陸相板垣，這位板垣就是「不久以前曾聲稱日本不能放棄一寸佔領中國之土地」的，這種變遷，只有看見槍桿子就發抖的人纔會看不見。若說要等到軍部下台之後纔有和平可能，以至於容易得到有如大公報所說「至時祇要一轉念間，兩國立可罷戰」，那末，我就要請問誰能使軍部下台？依照日本資產階級的會議政治的發展趨勢，以後只有一步比一步更法西斯化，可知要想由會議政治來推翻軍部是不可能的。如果是由無產階級的專政革命來推翻軍部，這更不能像做策論那樣有把握。列寧當時尚且不敢預斷德國的革命何時爆發，以為支持對德戰爭的保證，我們又怎能預斷日本的革命何時會爆發？

像大公報那樣主張和平，又同時反對和平，此種油腔滑調的說法，以之應試博選則有餘，以之分析事理則不足，而其所以如此，則無非表現其為二丑的身份，據魯迅說，二丑的訣竅就在于兩面討好，而又對兩面有微辭，以便順風轉舵，為日後留下餘地而已。

以上我們把第三國際的，一部份中央同志的，英美的，以及大公報的機會主義的和戰觀作一檢討之後，我們認為汪先生的和平建議雖備遭造謠中傷，而屹然樹立如故。



動搖之害

今天的政策很簡單。能戰就戰。不能戰就不戰。可和就和。不可和就不和。不戰就和。不和就戰。

怎樣是能戰就戰呢？如中國兵力完整，財政豐裕，名城安全，交通通達，縱然不能着着制勝，也可以步步堅守，處處反攻。這就是能戰。能戰當然繼續與日本戰。

怎樣是不能戰就不戰呢？如中國兵力破碎，財政枯竭，名城盡失，交通截斷，不獨無力制勝，並且步步潰退，處處逃亡，這就是不能戰。不能戰當然不必再與日本戰。

怎樣是不可和就不和呢？如日本定要征服中國，或提出亡國條件，要限制中國的軍備，要永佔中國的領土，要設置軍事總監，要控制中國行政。這就是不可和，不可和而和，仍然亡國，和而亡國，不如戰而亡國。

怎樣是可和就和呢？如日本感覺中國之不可亡，提出不致亡國的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中國國家獨立與生存可保，淪陷區域可復。這就是可和。在戰敗之時，可和

當然只有和。

何以說不戰就和呢？中國今日想以軍事收復失地，已不可能。反攻勝利，遙不可期。名城大邑相繼亡失。戰爭前途，不可樂觀。國際援助，不能救急。奧大利，捷克，阿比西尼亞，以至於西班牙，種種先例，尤可寒心。中國今日之事，理應不戰就和。

何以說不和就戰呢？汪先生深知中國再戰便只有滅亡，不如趁我們的政府還可以支持，軍隊還能夠存在，日本已不願再戰，條件不致于亡我的時機，斷然作和平談判，於國有利。不料重慶方面受了共產黨的脅迫，劇烈的妄加處分。汪先生受了狂妄的處分，固然不因而動搖他一貫的認識，也不因而毀損他偉大的魄力，可惜重慶方面自閉其和平的門戶。試問我們既無力制勝，打到何時為止，打到何狀為止？試問我們只有後退，退到何地為止，退到何時為止？如果我們不把「國家」爲兒戲，不以「民族」作孤注，爲什麼這樣的處置？然而事已至此，和無可和，無論怎樣困難，只有戰了下去。

然而事情的變動，常出于人們意料之外。在汪先生處分公佈以後不久半官的大公

報以社論透出和平的消息。前日路透社又傳出官方的談話，明白表示和平的意思。我們以爲我們政府自一月一日以後，是不戰，不和，不守。不料現在仍然想望和平。在我們的心裏自甚安慰，安慰是我們的見解與主張，已爲政府所接受，或者更正確的說，政府現當局的見解與主張，與我們是一樣的，這就是說，中國無可再戰了，還是和罷。

然而我們要正告重慶官方的是「不戰就和，不和就戰」。國家不是兒戲，民族不能孤注。政府的政策要迅速敏捷，要堅定果敢，要光明正大。如果時而高調抗戰，時而試探議和。時而痛恨主和之人，時而透露求和的話。這樣動搖。這樣閃爍，這樣迷離恍惚，只有撼動軍心，混亂人意，其結果反成爲不戰不和，亦戰亦和。其結果只有在和戰不定之中亡國。



論「寧可亡國不可丟臉」

君 泰

心裡明白知道中國沒有法子把日本兵打出國境去，嘴裡却偏偏嚷着「統一抗戰到底」，「最後勝利必屬於我」，這些人不特頭腦糊塗，而且心懷叵測。他們的實際希望乃是中國滅亡，國民黨坍毀；好讓他們的祖國——蘇聯出頭，好讓他們的私黨——中共得意。

明明知道中國沒有法子把日本兵打出國境去，但是又覺得事已至此，非打個到底不可，打下去雖然不免要亡國，可是不打呢？那是「丟臉」了！爲着維持臉面，爲着爭一口氣，還不如打下去的好，最少也博得一句「雖敗猶榮」！這些人的心裡是各自爲個人打算的。

我們覺得，這裏有一點要分別清楚，那就是道德的觀念，站在個人的立場，以及站國在家民族的立場，這其間是截然不同的。在個人的立場上，有所謂「公理」，「正誼」「義俠」等等的美德；但在國家民族立場上，就乾脆只有一個「利害」，利害就是是

作一個人，義不爲強敵所屈，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縱使斷頭折足，也不追悔，這是勇士，但古時賢哲也是評量事態的輕重，加以判斷，如果爲洩一時私憤而輕生，也是被譏笑爲「匹夫之勇」，愛國的武裝同志們，假若有些是主張「寧可亡國不可丟臉」的，我們實在不能同情。把握國家生存的時機，以挽救國家民族的生命，這是仁者之所爲，惟其大仁，所以大勇，英雄正須具此本色。並且我們曾經說過，現在挽救國家民族的時機，乃是年餘以來奮鬥的結果，在抗戰期中，軍人們的英勇鬥爭，一點也沒有白費。目前的問題，乃在於怎樣去運用這個由鬥爭得來的時機。我們希望大家從大處着眼，大處着想，切莫再說「寧可亡國不可丟臉」這一類的話！

「論專制可亡國不可丟臉」



五中全會陳辭

流沙

當此五中全會行將開會之際，我們有幾句話要告訴大家——
我們主張考慮和平。我們反對跨黨。

關於和平，我們經已發表我們的正面理由；我們並且從公開的言論上綜合地攷察了反對方面的理由，認為這些反對的理由都不能成立，而且都不能代表民意。

要說明這一點，只要看看他們自己駁斥自己就得。

甲說：「有國際民主陣線在那裏替我們保鑣，我們絕對無須考慮和議」，乙起來修正說：「我們不稀罕第三者的幫助，中國要自力抗戰下去！」大家聽聽，只剩下自力抗戰了。

自力抗戰又會抗成什麼樣子呢？丙說：「我們要打到日本崩潰，為什麼不打下去」？丁起來修正說：「日本不滅亡整個中國不肯罷手，我們左右是死，為什麼不打下去」？戊又起來修正說：「今後我們即使打不出去，但是日本也打不進來，我們就和他僵

持下去吧」。大家聽聽，又只剩下僵持了！

如果你再問他，這樣僵持下去會變成什麼樣子？他就不耐煩了，嚷道：「抗戰就是一切，僵持就是最後勝利，僵持就是僵持！」

這正是一幅黯澹的圖畫；在黯澹的圖畫的周圍，不會有什麼熱烈，這個我可以保險。要人們的通電，擁護或反對，和文人們的激昂慷慨是什麼回事，大家肚裏都雪亮。民衆呢？民衆有苦說不出。

可是，我們要指出，照現狀看來，我們運用國際的合從連橫以抗戰，已快到了盡頭，最近英美致日通牒，據我們看來，表面上好像是對我國抗戰一種有力的幫忙，但骨子裡却就是非正式調停的開始。今後我們應當運用國際的合從連橫以考慮議和。僵持只能作成絕望與疲倦，結果是不忍說的。我們的主張是，議和對外必須主動，對內必須民主，其條件則以去年臨全大會宣言的原則為根據。我們有把握敢這樣說，在政府裡，在城市裡，在鄉村裡，以至於在前線，同情我們的人是在一天比一天增加起來。

關於跨黨，我們要指出這是一個騙局。中共對內秘密宣傳的小冊子「中國共產黨

的策畧路線——張浩（即林毓英）講——說道：

『五，滲透國民黨各組織內去工作，不要有左的傾向，如國民黨紀念週，讀總理遺囑，我們就讀總理遺囑，但在我們同志加入時，要有兩個觀點：（一）要明白爲黨工作，讀總理遺囑是表面的事，是掩蓋我們的物件，我們布爾什維克，仍是布爾什維克。（二）我們認爲讀總理遺囑，是一個開玩笑，是一個好玩的事』（四四頁）

又說：

『在國內方面，聯合其他的黨派孤立國民黨，影響國民黨，使其勢力削弱，加緊其搖動，在國民黨的內部，聯合左派（××××，×××，××××，××××等）爭取右派（××××，××××，××××，××××等）打擊分化親日派（×××××的一切并×××，×××，××××等）。（一一一頁）

我們極力反對中共的這種陰謀，我們並且要求國民黨員或非國民黨員和我們一致反對中共的這種陰謀！在國民黨員，應當知道吸收黨員是如何嚴肅的一回事，決不應

當讓中共的黨員這樣偷偷摸摸的攢了進來。在非國民黨員，應當知道中共的跨黨不僅是對國民黨的一種欺騙，而且是對工農的一種欺騙。這裡我還要引幾節：

「四，暫時放棄推翻國民黨及土地革命階級鬭爭，以博得到更廣大的國內後備軍」。(三八頁)

「所以現在以抗日在前，土地革命在後，階級鬭爭也放在後面……所以現在這個革命低落的時候，就事事以抗日為主，土地革命次之，抗日在明處，土地革命在暗處。」(三二—三三頁)

「故暫時放棄土地革命，而並不是放棄土地革命」。(四四頁)

中共在這些地方，欺騙工農比欺騙政府更甚，這可以引列寧的話來形容他們：

「……你們甚至不肯直接說，現在要不要秘密的社會民主黨，要不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斯托里平面則你們就說不要（「我們的曙光」），而在黨員面前，在秘密刊物上，你們就不敢這樣說，你們說東說西，想藉此逃身。——中譯本列寧選集第七卷七四頁）

中共現在究竟要不要共產主義，或者乾脆服從三民主義，或者放棄階級鬥爭；放棄土地革命，或者不放棄，他們總是「說東說西，想藉此逃身。」這已經喪盡了政黨的風格，成爲政客軍閥鈎心鬪角，而我們現在，却是不願意有任何政客任何軍閥在我們頭上甜言密語，耀武揚威！

我們主張考慮和平！我們反對跨黨！

第五卷會誌



中央將接納和議乎

若

自汪先生艷電發表後，中央於匆遽之間即予汪先生以開除黨籍之處分。各地方不明白國家利害之報紙，尤其共產黨之宣傳機關，遂對汪先生肆行攻擊，不留餘地！吾人生活於此四十餘日誣蔑威嚇之空氣中，以為東亞和平從此將永久無望，但吾人亦深知中央對於汪先生和平建議之處置，誠出於共產黨及準共產黨之脅制，和平之願，固為中央之本旨也。

果然事實不出吾人所料，本月九日路透社重慶電所載中國官方聲明，對於和平旨趣，已昭然若揭。茲畧論該聲明中重要各點如次：

一，該聲明中最重要之一點，即將和戰問題歸結而為條件問題。所謂「日方似冀求停戰，但其條件以勝利者自居；為中國所永遠不能接納者。反之，中國所提出之條件，亦為日方所不能接納者。」一言以蔽之，議和與否，其癥結在於條件之輕重，此點正與汪先生之主張相同。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聲明，平心而論，決不能謂為亡國之

條件。如依汪先生所解釋，則於我方較有利之點更多（日本諸大臣在議會中之談話，亦並未否認汪先生之解釋）。汪先生不過希望「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近衛聲明）爲和平之談判」，並非如大公報記者之主張「無談判無條件」的媾和。無談判無條件之和平，乃真爲投降。如仍爲對等之議和，則條件之減輕，勢非取談判之方式不可。汪先生不過主張開始「爲和平之談判」。中央不但不予以採納，而反予以開除黨籍及褫奪一切職務之處分。我深爲中央惋惜，亦深爲中央被共產黨壓迫之苦衷，致無限之同情與憤慨！

二，該聲明一則曰「日方似願意停戰，再則曰「日本之目的不過爲加強其政治動作之一種步驟而已」。此種認識亦與汪先生所謂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之見解，正相暗合。日本既無滅亡中國之力量，同時而又有和平之意願，則依極簡單之邏輯，即可推知其所提和平條件，決不能爲滅亡中國之條件。既非亡國條件，則何苦不就此而尋求一和平之途徑。上文所謂「永遠不能接納」云云，亦僅爲表面之詞而已。

三，該聲明中與汪先生電所微有不同者，在乎汪先生主張不妨直接談判，現在

重慶官方則堅持非經國際會議不可。其實汪先生並非反對用國際會議以解決中日糾紛（參看艷電末段）不過汪先生似乎認定即使採用國際會議的形式，中日之間亦不得不預先或同時而有一度之直接談判。更進一步言之，即使日本接受國際調解，在遠東開一四強或五強會議，其結果亦正如日昨星島日報記者所謂等於明興會議而已。換言之，在遠東之「明興會議」中，中國不能不有所犧牲，然亦決不至於亡國。其所以不得不犧牲者，亦正與歐洲之明興會議相同。歐洲如無第三國際之陰謀搗亂，則捷克與西班牙決不至犧牲如此之大。遠東如無第三國際之陰謀搗亂則中國犧牲亦不至於如此之大。第三國際在歐洲陰謀愈大，搗亂愈久，則英法德意聯合愈堅。第三國際在遠東陰謀愈大，搗亂愈久，則英美法對日本讓步愈多，所謂「抗戰到底」乃第三國際授予中國共產黨之陰謀口號，可惜中國舉國上下盲然相從。最近中央對此點似已覺悟，或早已覺悟而苦於不敢言。至此乃不得不直言之，故云「如歐洲局面，仍採妥協及讓步政策，誠恐國際將動用壓力，使中日兩邦不得不舉行談判，以結束戰爭。」此在重慶當局經已明白認定明興會議為不可避免之事實，且不得不希望其及早實現。

四，該聲明內容已暗示共同防共可以接受。「其不易解決者爲防共問題，但此問題至今仍不能具體解決」根據英文稿。最後并鄭重聲明「中國必賴於英美」，「共產黨之地位決不足以匹敵國民黨」。此種暗示，無非說明中國如能得一合理之和平，則共同防共未始不可考慮。中央若果具此決心，則吾人誠不勝爲民族前途致無量之慶幸也。

總之，自汪先生艷電發表後，全國輿論，可謂「口非心是」。中央對汪先生之處置可謂徒失人心。故最近重慶方面，不時有故意製造和平空氣，以爲安定人心之手段。此次聲明，其目的如僅在安定人心，則吾人認爲毫無意義。若果具最後之決心，力脫共產黨及準共產黨之脅制，則大局前途，尙有一綫之希望。

外交當局的和平談話

仲丹

去歲歲杪，汪先生建議和平，當時中央爲人挾持，竟昧然加以拒絕，但國內國際情勢昭然，實有及早結束戰事之必要，於是本年二月間，卽有政府某官員對路透社發表談話，表示和平，並主張以國際會議解決中日戰爭，此係政府之暗示，至爲明顯。茲外交部長王寵惠氏又正式發表談話，闡明『中日戰事目前如求和平解決，其唯一可能途徑，厥爲召集一九國公簽字國之圓桌會議』。由此可見政府已漸明瞭現實情形，對於和平問題，並不再諱莫如深。吾人願就王外長之談話，提出數點，以資商榷。

外交當局的和平談話

王外長談話中認爲召集一九國公約簽字國之圓桌會議，爲和平解決之唯一途徑，於此可見政府對於國聯方面，至少已不加重視。本來國聯在理論上固爲一國際間最廣泛之組織，而在實際上則歐洲色彩渲染甚濃，降至今日，又形同冷廟，其不能我助，事實昭彰。遂不得不訴諸九國公約，以爲解決中日問題之張本。又談話中僅主張應用抵貨方法，以促日本就範，而不言經濟制裁，對於國際間之希望，非若以前之空洞玄

虛，此其一。

雖然，以九國公約會議解決中日戰爭，此主張固不自今日起。當前年戰事開始不久之後，九國公約簽字國，即在比京白魯塞爾召開會議，惜因日本拒不出席，該會遂毫無結果，此次王外長之談話，仍認為『日本在現時或不願接受，』但以為『日本如經久戰之後，軍力微弱，則或將接受調解，亦未可知。』於此吾人須注意者，即日本之希望早日結束戰事，殆為世人所週知，惟日方對於用國際會議形式，反對甚力，至於不採取國際會議形式，而由一國或數國從中調解，此項辦法，鑒於前年德使陶德曼之奔走，中日兩方似皆可接受。再就事實言之，此次戰事中，日本海軍實未有損失，若謂俟其迫受調解，為期似仍甚遠，如欲早日結束戰事，尤應即日開始自主外交，故就本點言之，吾人認為政府對於國際間之認識，雖比較切於實際，但尚未盡然。此其二。

談話中提出九國公約簽字國，並又希望蘇聯敦促日本結束戰事。按蘇聯並非該公約簽字國，僅對於東亞有密切關係，邀其參加，固屬合理之舉，惟吾人須注意者，即

今日之事，中日兩國爲重，其他各國之關係，則屬次要，吾人所着重者，在維持該公約之本質，即維持中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所認爲可通融辦理者，則爲參與調解之國家。該約簽字國中，如被認爲對於調解工作，足以發生阻礙者，吾人未始不可婉詞却之，其非爲簽字國，而被認爲對於調解工作，足以發生良好影響者，吾人未始不可邀其參加。總之，吾人之一切方案，總期不致歧視有關任何國家。假設我人提出一國請其參加，日本表示反對，而我國竟加堅持，寧願調解不成，此則重視他國利益，忽畧自身之事，可謂本末倒置，故在國際調解之時，對於參加之國家，吾人不得不特加注意。此其三。

關於直接交涉，本談話中未予提及，誠以國際調解，非同判決，故兩方之意見必須尊重，假設和平條件，非我所可接受者，則無論其爲直接交涉或國際調解，其不能接受一也，况欲正式解決兩國糾紛，則非雙方直接折衝不可。此次談話中，未表示反對直接交涉，蓋有深長之意，吾人不可不察。此其四。

此外吾人所欲言者，厥爲對於國際調解與直接交涉之誤解。常有以爲國際調解，

即係列強對日壓迫，而直接交涉，勢必我國受日欺侮者，其實不然。夫參加調解之國家，必須得兩方之同意，通常俟兩方願意開始交涉，其任務即終了，即進一步提出一種方案，要亦須兩方願意接受，否則成爲第三國援助交戰之一方，而非國際調解矣。至於直接交涉，本爲獨立國家之權利，決無放棄之理，吾人只須確定立場，何致受欺，況就當前情形而言，吾人認爲直接交涉實較有利。又有以爲國際調解之結果，因有他國之參預，可資保證。至於直接交涉則否，此亦不盡然，夫條約之尊重，必須吾人自身尊重之，又吾人必須有使對方尊重之方畧，否則國際間之保證，其效甚微，吾人試觀九國公約之被破壞即可知其然矣。

吾人觀察目前情形，實有從事結束戰事之必要，今茲王外長之談話，足見我國政府已有此意，並不辭宣佈其大概，深信不久將有更明白更切實際之表示以促成汪先生建議中之主張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民國三十三年
四月
二十一日

國家圖書館



001687416

香港

南華日報社叢書

第四種

南華日報評論集第二輯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一日出版

續和戰問題之討論

編輯者：

南華日報社編輯部

發行者：

南華日報社營業部

社址：

香港荷里活道四十九號

每冊定價 港幣五分 國幣八分

電話：二五六一二號

有線電掛號：五四七八號

無線電掛號：九八五〇號

郵政信箱：三六九號

3.5
65

籍